

# 求是：民间科技基金样本

超豪华阵容的科学家顾问团一直保持低调运作，保证了求是科技奖的独立性和含金量，扎实而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本刊记者 / 钱炜 (发自天津)

81岁的药学家屠呦呦最近突然“火”了起来。她作为抗疟药青蒿素的主要发现者而获得国际医学大奖——拉斯克奖，甚至被认为是“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科学家”。此前，屠呦呦一直籍籍无名，不过，并非没有人褒奖她的科学成就——早在15年前，屠呦呦及其青蒿素研究团队就获得了求是基金会授予的“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这是第一个对屠呦呦的贡献做出肯定的大奖，“求是奖”的眼光和分量由此可见一斑，可是它却一直像屠呦呦一样默默无闻。

在中国科教界，与致力于打造“东方诺贝尔”的邵逸夫奖、官方色彩浓厚的何梁何利奖相比，由香港实业家查济民先生创办的求是科技基金会并不引人注目，但它却是成立最早、最先进入到内地的基金会之一。

## 当年的获奖者买不起一套西装

1994年，第一届“求是奖”评出了10位杰出科学家，其中有8位是“两弹一星”元勋。颁奖仪式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等国家领导人出席。

可是，这样风光的事，却有人“不买账”。当时，查济民意外接到通知，10位获奖人中有一位不愿来领奖。于是，他携长子查懋声一道去获奖者家里拜访。但无论如何劝说，这位科学家抹着眼泪就是不肯去。他的太太偷偷告诉查济民，丈夫不愿去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钱买一套体面的西装。

“我见到父亲流泪只有3次，其中一次就是第一届求是奖颁奖的时候。”求是科技

基金会主席查懋声回忆说，他本人也是从那时起，意识到父亲创办基金会的意义。

“不做锦上添花，只需雪中送炭”，这是查济民创办“求是”的出发点。

上世纪90年代初，“科教兴国”战略还没有明确提出，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还处于重建过程中。在整个社会层面，“文革”将知识分子变成“臭老九”，而发端于1980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又形成“一切向钱看”的倾向，科学与科学家，多年来未能在社会上获得足够的尊重。

为此，查济民拿出2000万美元创办了求是基金会，专门用于奖励内地的科学家。他当时说，“国内的改革开放还刚起步，各方面都十分需要资金，而国家不可能一一都照顾得到……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为国家和人民做出重大贡献，但他们不但寂寂无闻，而且生活上还相当清苦……我们很想为改善科学家的收入做一点工作，给予一点物质上的奖励。”

求是基金会希望以每人100万元的重奖，来冲击国内的思想观念，促进尊重科学风气的形成。在当时，100万元对于科研人员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数字，彼时的国家科技奖励特等奖，最高也不超过20万元。

自创立以来，“求是”致力于奖励中国学者，迄今已评选出数百位在数学、物理、化学及生物医学等领域中有杰出成就的中国科学家，分别授予他们“杰出科学家奖”“杰出青年学者奖”和“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并先后在20余所大学设立了“求是研究生奖学金”和“查济民、刘璧如大学生奖学金”，以奖励优秀博士生，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生。迄今为止，求是

基金会已累计颁发奖励金逾亿元。

## 顾问团始终保持超豪华阵容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张伟平是陈省身的关门弟子。1990年代初，他留学法国，毕业时，法国导师以优厚的条件挽留。对此，张伟平犹豫不决，因为如果回国，就只能从一个月200元工资的助教做起，两者相比，差距甚大。为留住人才，身为求是基金会顾问的陈省身，不顾自己80岁的高龄并正患感冒，连夜赶赴香港，向查济民求助。

当时，求是基金会开始意识到，有必要对青年学者，尤其是从海外归来的青年学者加大支持力度。于是，1995年，第二届求是奖新设“杰出青年学者奖”，给予获奖者连续4年每年1万美元的支持。张伟平就是第一批获资助的青年学者之一。

当年，基金会的顾问们和查济民就如何更好地支持青年学者的问题做了多次探讨。从1995年到2001年，求是基金会一共资助了120位青年学者，他们中有很多人如今都成为中国科学界的顶梁柱。有人甚至称，这段时期的求是奖，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后来在国家层面上吸引海外人才的“千人计划”。

在今年的颁奖仪式上，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对求是杰出科学家奖得主张首晟开玩笑说，“你接下来是不是再努努力，拿下诺贝尔物理学奖呢？”

斯坦福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张首晟2007年发现“量子自旋霍尔效应”，在拓扑绝缘体的研制上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曾在去年获“欧洲物理奖”，成为这一国际大奖的首位华人获奖者，而该奖也被看



2007年9月8日，作为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顾问，知名华裔生物医学专家、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创始人何大一（左）在武汉开幕的2007中国科协年会上，向5位获得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的内地青年科学家颁奖。摄影/中新 孙自法

作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风向标。

多年以来，“求是奖”的获奖人都是“潜力股”：他们要么在获得官方认可之前，就已得到了“求是”的肯定，要么尚在“小荷才露尖尖角”之时，就已得到“求是”的资助。

翻开“求是”获奖人的名单，会发现一连串熟悉的名字：白春礼，1995年获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现为中科院院长；王振义，1996年获得求是杰出科学家奖，2010年获国家科技最高奖；陈竺，1998年获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现为卫生部部长……

“求是奖”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还要归功于基金会顾问团对科学成就的判断力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洞察力。它的顾问团有着超豪华的阵容：一代数学大师陈省身，著名物理学家、“两弹”元勋周光召，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远哲，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发明者何大一，基因诊断之父简悦威，计算机界最高荣誉图灵奖得主姚期智。

每年“求是奖”的获奖者，就是由这些科学大师们一起讨论商定的。与国内很多评奖不同，求是基金会不接受组织与个人的申请，也不受任何外界力量的干扰。

### 如今百万元奖励只是个“补充”

“求是”的特点就是始终根据中国的发展，来寻找奖励的方向。所以，求是基金会从一开始就没有按一个固有的办法来发奖，而是每一次都要认真研究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还有什么不够的地方、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基金会就利用它的力量在社会上通过发不同的奖，来呼吁、提倡和改进。”周光召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这样总结。

他举例说，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不是很重视基础研究，求是基金会就重点支持数学、化学、物理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同时对当时国家尚未关注到、但具长远意义的领域予以扶持，比如对沙漠研究给予了两次奖励，对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也予以支持。

周光召说，“我们就是根据对中国科技的了解，对人的了解，来保证‘求是奖’的含金量。”

杨振宁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求是奖”的创办开国内科学大奖之先河，对中国科技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实际上，以“求是”为代表的——批民间科技奖励基金，对中国官方的科

技奖励制度、乃至整个科研体系都是有益的补充。

中南大学教授李侠就指出，国家科研资助渠道的单一化，是造成科研人员“跑项目、轻研究”的重要原因。很多科研机构与科学家们不得不在推进科学发展与项目中标二者间作艰难选择。以实用主义的策略套取国家科技资助的行为屡禁不止，这种行为将导致整体科技资源处于低效率运行的状态。

而扩大科研资助来源、发展私人基金会，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在美国，私人基金会与政府、企业和高校一起，是其科研经费的4个主要来源。美国有几万家私人基金会，规模大小不一，大的拥有数亿美元，小的有数千美元。正是无数私人基金会的存在，使很多由于政治或经济利益的考虑，政府与企业无暇顾及的项目得到资助，从而推动了美国科技的整体发展。

不过，随着政府对科技的支持不断加大，对于如今的中国科学家们来说，百万元奖励已经不算是什么天文数字了。如何通过基金会的奖励，更有效地推动中国科技的发展，是基金会的顾问们和其“当家人”查懋声正在考虑的问题。★